

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的生成逻辑和理论价值*

刘思姚 周建超

[摘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是列宁晚年从整体上对十月革命道路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思想总结，它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扎根于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面临的特殊历史环境，起因于对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关于十月革命谬论的驳斥，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逻辑。列宁在文中运用历史辩证法，深刻阐释了世界历史发展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过程，科学论证了俄国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全面阐明了俄国需要以与西欧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大胆预判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革命具有更多的特殊性等，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光芒，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 列宁 《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东方落后国家 十月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在发展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曾经设想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支持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他们同时也强调，一切都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研判。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上述重要观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面对国内外严峻复杂的形势，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深入思考，撰写了大量文章。列宁在晚年通过口授完成的《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以下简称《论我国革命》）一文，运用历史辩证法有力批驳了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代表人物对十月革命的否定，深刻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过程，认为介于“文明国家”和“东方落后国家”之间的俄国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可以先革命夺取政权、后创造条件建设社会主义，以期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加速俄国现代化历史进程，达到与西方现代化同步的目的，充分论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揭示了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多样性。

现有研究主要从文本产生的历史原因、文本的思想内涵、文本的理论意义三个方面对列宁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与推进路径研究”（23ZDA013）的阶段性成果。

《论我国革命》进行了论述，为我们深入研究《论我国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具有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一方面，以往研究仅就《论我国革命》中蕴含的某些思想，如“先夺权、后建设”等展开，而对这一文本生成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包括第二国际、孟什维克代表人物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的不同观点论争，缺乏前因后果的关联性研究。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对《论我国革命》中提出的当时俄国选择十月革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发展社会主义，巩固工农联盟的苏维埃制度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保障，以及科学预判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等问题，还缺少集中性的整体阐释。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解读经典文本和分析客观史实相结合，以从整体上进一步考察列宁《论我国革命》的生成逻辑及其蕴含的思想内涵，为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论我国革命》的生成逻辑

关于俄国十月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革命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争论由来已久。1923年1月，列宁分两次以口授的方式完成了《论我国革命》一文，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对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们对十月革命的诘难进行了严厉批驳，有力论证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

（一）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

19世纪后半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爆发经济危机，但无产阶级革命尚未发生，而相对落后的俄国等国革命形势逐渐高涨。此时俄国早期进步理论家、革命家请求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形势下对俄国留存的农村公社能否成为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给予答复。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对东方社会以及俄国未来进行深入思考。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充分，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观点是，如果俄国能占有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积极成果并依靠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外部因素，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875年，恩格斯针对俄国民粹派彼·尼·特卡乔夫（П. Н. Ткачёв）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鼓吹俄国可以借助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批判，强调只有“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①，俄国才有可能转向社会主义。此后，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他此前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是“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因而不具有普遍性，至于俄国未来发展，“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②。面对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的境况，走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0、824页。

历史发展十字路口的俄国究竟往何处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然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俄国农村公社迅速瓦解，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已成为必然。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依据俄国社会经济的新发展明确指出，“较低的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②，并认为“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③。在这种背景下，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为西方的工人运动“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④。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批判了那种不顾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把农村公社当作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观点，阐明了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时代，世界无产阶级应依据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选择自身的革命道路。这既是对他和马克思20余年来探索俄国革命问题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先前设想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观点的升华，从而构成包括列宁在内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研究世界历史变革、探讨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及其前景的逻辑起点。

（二）历史镜鉴：十月革命道路探索实践的智慧经验总结

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在《论我国革命》中认为要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与时代背景和俄国“特殊的环境”^⑤结合起来，才能科学阐明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1922年年末，列宁在病重被迫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后，得以有机会冷静地反思十月革命前后所走过的道路，及时总结探索实践经验，以为俄国留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战略等等的总计划”^⑥，并把这些思想公开出来。事实上，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由于经济、政治、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国内各阶级力量之间展开了激烈博弈，资产阶级与沙皇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并最终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沙皇政府加入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更加剧了俄国工人和下层民众对沙皇专制统治的不满，直接引发了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统治被推翻。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前者囿于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给人民和平，因为它是主战的政府”，“不可能给人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2-31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1页。

⑤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3、375页。

⑥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6页。

面包，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府”^①。因此，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及时提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②。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代表最广大农民和工人利益的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但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处境依旧艰难，农民占比大，生产力低下，加之连年战争，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为了兑现当初“和平、面包和自由”的承诺，苏俄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提高生产力、恢复国民经济作为第一要务。列宁指出：“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客观条件的凑合给我们造成的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机体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③但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联合起来采取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支持苏俄国内反动势力发动叛乱，最终导致国内战争爆发。国内战争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造成更为严重的困难，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至1920年三年国内战争结束时，苏俄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1913年的13.8%，减少了6/7，农业耕地面积缩小25%，农产品产量只为1913年的65%^④。为了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实行了以“余粮征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在当时是权宜之计。但战争结束后，继续施行这一政策必将引起工农的不满和抵触。面对严峻形势，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是时候需要制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方法，以恢复和发展苏俄经济，改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1921年5月，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列宁带领布尔什维克党毅然地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调整为“新经济政策”，正式拉开了苏俄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序幕。

上述历史表明，腐朽落后的沙皇专制是俄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而二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维护着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利益，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人民渴求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等问题，因而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历史必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依据当时的历史情势及时提出了这一转变任务，领导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在十月革命之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列宁又结合俄国的特殊环境，不断调整政策策略，成功探索了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俄国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时代课题，体现了其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的深刻认识。

（三）直接动因：对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关于十月革命谬论的驳斥

十月革命爆发时，俄国的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在社会发展总体水平方面属于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到底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问题再次被提出。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认为，在当时的俄国农业还占主要地位，工业刚刚起步，工人阶级尚未接受训练，布尔什维克党就通过十月革命这样的暴力革命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种冒险事业，其实质是“企图通过一系列专横行动而撇开必要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尝试”^⑤，即

①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5页。

④ 参见王伟光主编：《社会主义通史》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6-117页。

⑤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伯恩斯坦言论》，北京：三联书店，1966年，第406页。

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①，因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搞糟了。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则断言，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俄国贸然发动的革命是“早产的”，“如果还继续想用比喻来说明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更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②。尼·苏汉诺夫（Н. Суханов）是俄国的经济学家，他在1918年至1921年间撰写的七卷本《革命札记》中重提第二国际理论家们迂腐不堪的“经济决定论”，一再重复俄国根本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进而否定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对此，列宁从理论上进行了有力驳斥，他说，“这几天我翻阅了一下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我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迂腐”^③，这就是一味照搬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主张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暴力革命方式来夺取国家政权的想法，将马克思所指出的西欧国家发展一般道路教条化，认为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等到生产力高度发展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曲解，即企图用一成不变的框架来规定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其思想方法极其迂腐，盲目地模仿过去，“不敢稍微离开一下德国这个榜样”，他们“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从不敢想象依据不同时间和条件对“这条道路作相应的改变”或“某些修正”，完全忘记了“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的“直接指示”，只是“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④，其实质就是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否定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列宁指出，“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为”^⑤，其“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怯懦的改良主义者”^⑥。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⑦。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之所以否定十月革命的必然性，根本在于他们从本本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仅停留在对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认知上。而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与时代背景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无产阶级可以先用革命手段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经济文化前提，然后再运用苏维埃政权和制度力量加速本国现代化进程，以实现赶上西方国家现代化水平的设想，并领导布尔什维克和俄国人民进行了伟大

① 殷叙彝编：《伯恩斯坦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92页。

② 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5-376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3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3、374页。

⑤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7页。

⑥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4页。

⑦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

的十月革命，走出了一条具有苏俄特色的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这是《论我国革命》生成的直接原因。

二、《论我国革命》的思想内涵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运用历史辩证法充分论证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深刻阐述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具有更多的特殊性作出了科学预判。

（一）深刻阐述人类社会发展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过程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个民族内部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发展程度，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发展大致经历了“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①。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加以概括，认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②。这一论断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生产力发展水平起决定性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演进。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宏阔的历史视野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③换言之，人类社会并不只是在既定轨道运行发展，“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④的观点是荒谬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寓于各国发展的特殊性之中，各国发展既体现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显示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具体性。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反复强调，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是世界历史一般性规律和各个民族国家特殊性表现的产物。俄国人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单单是参与到世界历史的进程，最主要的是创造了这一历史进程”^⑤。因此，俄国先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革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走出一条符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世界历史一般性规律和特殊性表现的演绎产物。

（二）科学论证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列宁始终以辩证的眼光分析俄国革命形势。早在1915年列宁就指出，任何一场战争都有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8-1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4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6页。

⑤ 张振鹏：《列宁社会批判思想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2年，第188页。

特殊性，“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别地研究每次战争”^①。列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以侵略扩张为手段，以镇压工人运动、压迫其他民族为目的的战争，昔日的资产阶级已经从进步阶级转变为反动阶级。沙皇俄国在战争中接连失利，国内经济被严重破坏，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战争无疑加速了俄国国内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手无寸铁的工人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才有出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强调俄国革命“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②，即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特殊历史形势“催生”着俄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同时，列宁指出，“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③。从本质上讲，俄国是一个小农国家，但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相比东方其它落后国家是先进的，而相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又是落后的。也就是说，俄国封建残余势力的存在，成为阻碍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导致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仍十分落后，使俄国成为整个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和矛盾斗争的集合点，易造成特殊的革命形势。正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三）全面阐明了俄国需用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方法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

列宁在论述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时反复强调，如果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成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辩证地看待这一历史规律。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大胆提出了“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④的科学设想，即先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后创造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正是在列宁这一思想指引下，苏俄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第一，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俄国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使列宁充分意识到，在革命后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行不通，“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⑤。对此，列宁决定采用“迂回过渡”的策略，推行新经济政策，即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发展苏俄生产力。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使苏俄经济迅速恢复。当然，经济建设是苏俄最艰巨最困难的任务，也是一项长久的事业。为此，列宁提出了一条著名的社会主义发展公式，即“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秩序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 + + = 总和 = 社会主义”^⑥。可以说，列宁从时代高度科学回答了

①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4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4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6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4-445页。

⑥ 《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0页。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即先革命夺取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先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后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二，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社会主义文化水平。加强文化建设，使苏俄整体文化水平赶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论我国革命》的重要思想。列宁认为，“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而“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①。因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推动“文化革命”。“全体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组织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学习。”^②对于农民的文化教育应与顺利开展合作化结合起来，只有农民们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才能认可、参与合作社。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了“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③的任务，并与革新国家机关结合起来，使其真正掌握和具备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本领，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切实提高无产阶级执政水平。

第三，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政治保证。苏维埃俄国虽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但是工人阶级只占人口总数的少部分，农民占大多数。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回答无产阶级怎样组织、带领人民以及怎样对待工农关系的重大问题。1917年11月，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大会上，列宁指出：“工人和被剥削农民的紧密联盟、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坚定不移的斗争，会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只有实行工农联盟才能获得土地与和平”^④。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没有根本相悖的地方。社会主义完全能够满足两者的利益。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因此，无产者同被剥削劳动农民之间的‘真诚的联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⑤。1921年6月至7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进一步提出，“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以便领导农民，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⑥。因此，在《论我国革命》中，列宁强调要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制度，要“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⑦，以达到与西欧国家同等的发展水平；“努力建成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⑧。可见，列宁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强调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正确处理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满足农民的需求，这样才能赢得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支持，确保无产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1、360、37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1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4页。

④ 《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9页。

⑤ 《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2页。

⑥ 《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页。

⑦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5页。

⑧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5页。

阶级的领导地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政治保证。

（四）大胆预判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革命具有更多的特殊性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批判苏汉诺夫等人对俄国革命错误看法的同时，从世界历史的宏阔视野作出预判，“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①。在列宁看来，在俄国革命进程中，中国、印度等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②。但相比俄国，东方许多国家还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或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甚至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所以革命运动必然表现出更多的特殊性，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也更加曲折。1919年，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谈及当时的形势时指出，“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③，因为它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全世界共产党人没有面临过的，它们被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参与战争的大多数是劳动群众，遭受着资本主义剥削，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范式的情况下，带领广大劳苦大众将共产主义一般原理应用到现实革命当中，根除中世纪残余势力^④。为此，列宁号召东方各民族，即便面临重重困难，都要结合自身的特殊性，形成联盟，团结一致，共同斗争，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在这里，列宁没有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公式化，也没有将俄国革命方式普遍化，而是强调了东方革命的复杂性特殊性，这是极具前瞻性的科学预见。实践证明，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带有各自的历史特点，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

三、现实启示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对伯恩斯坦、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关于俄国革命的错误言论进行批驳，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是一般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过程，科学预见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这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坚持“两个结合”，走独立自主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道路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⑤。在《论我国革命》中，列宁坚持革命的历史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来研究俄国革命的生成逻辑，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俄国国情的“先夺权、后建设”的革命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党在探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页。

④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

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时汲取了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克服以城市斗争为重心、企图速胜的“左”倾错误，将工作重心转入农村，从而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①的革命新道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全面学苏”到“以苏为鉴”，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再到改革开放后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的主张，党领导人民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结合”，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与科学回答，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③。只有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在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才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战胜众多未知的风险挑战，回答亟待解决的时代之问，创造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强调，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充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生产的有益文明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毛泽东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④，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邓小平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⑤，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充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并联式发展，在短短数十年内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陡增的背景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⑥。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努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6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①。同时，善于学习、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在顽强斗争中打开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新天地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有矛盾就会有斗争，“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②。面对当时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种种责难和质疑，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引用拿破仑的名言，“‘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③，借此说明要敢于革命，敢于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扫除障碍。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④。100多年来我们党以不屈不挠、勇毅前行的斗争精神，创造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伟业。新时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顽强的斗争意志，“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⑤，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使中国人民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的恢宏史诗。新征程上我们还面临着许多风险挑战：从国际看，虽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势不可挡，但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从国内看，随着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战略机遇、风险挑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也逐渐增多。面对复杂严峻形势，唯有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持续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提升斗争艺术，才能把国家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从容应对风险挑战，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总之，列宁晚年留下的《论我国革命》这一短小精悍、思想丰厚的不朽著作，充分运用历史辩证法，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阐明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特殊性和历史必然性，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特别是为中国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启示，彰显了独有的时代价值，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思想光辉。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我们只有始终坚持“两个结合”，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斗争中求发展，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巍巍巨轮冲破惊涛骇浪，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壮丽远航！

（刘思姚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周建超系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康晏如]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0-13页。

②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92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6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25页。

⑤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页。